

舌尖下的中国

一个饕餮民族的前世今生

【旅美】李麦逊 著



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必先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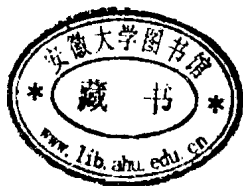
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作序

清华大学教授蒋劲松 · 中国政法大学黎安 ·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何祎皮
联袂推荐

舌尖下的中国

一个饕餮民族的前世今生

【旅美】李麦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舌尖下的中国 / 李麦逊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229-06285-9

I. ①舌… II. ①李… III. ①饮食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2244号

舌尖下的中国

SHEJIANXIA DE ZHONGGUO

【旅美】李麦逊 著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刘嘉 郭莹莹

责任校对：杨媚

装帧设计：艾瑞斯数字工作室clark1943@qq.com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mm×1020mm 1/16 印张：19.5 字数：290千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6285-9

定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当一个民族变成“吃货”

李麦逊（旅美）

今年夏天，北京几位学者朋友、素食者（清华蒋劲松、中国政法黎安等）和我联系，说CCTV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火得一塌糊涂，搅得广大吃货们夜不能寐哈喇子泛滥，并引发一系列后续现象。他们敦促我发文评论，也有出版界朋友催我修订书稿再版。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出书系统性反思、讨伐国粹食文化的不肖逆徒。因“非典”促成的这本书已出了四个版本，一晃十年过去了，我离国也六年了，对这一国粹的态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为激烈。

其实，十年前首版时的参考书名居然和这部纪录片一字之差：《舌尖上的中国》和《舌尖下的中国》。我不否认搭顺风车，权当添个景加道料，夹带点“私货”。

为了修订本书，特地去了CCTV的《舌尖上的中国》官网。整两天，除细看全片，连研讨会、拍摄花絮、创作人员及专家学者访谈都基本看了，当然，更能体现民意的海量的网络唾沫更不容错过。

《舌尖上的中国》用炫目的声光电、动人的小故事、悦耳的男中音和昂贵的高清器材拍成，堪称唯美主义色彩视觉盛宴。的确如编导所言，这片子是带着对食物的敬意来做的，希望观众能从对美食的热爱品读到对生活的热爱，看到中国的飞速发展。

该片另一位主创人员称，只想找到社会中最温暖的东西，自己没有刻意表现黑暗，那也是局部的东西，包括食品安全，“平静中性地表达，传递的是美好，就已经站在正义这一边了”。

正如每个钱币都有其两面，“舌尖上的中国”固然精彩，“舌尖下的中国”也不容错过。正如要找到一棵参天大树的秘密，你还得刨出它的根底。前世我们是饕餮，今生我们是吃货，成为身心健全的人，难道还要等来世？一个人想要获得灵魂的自由，必先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

这就是本书再版的意义。

感谢蒋劲松先生和黎安先生。在《舌》片“席卷”全国之际，他们及时在网络上呼吁吃货们冷静，推介本书（旧版本），并敦促我予以关注和抨击。蒋劲松多年前就为我写过书评。黎安先生的那篇精彩的书评，修订达五次，直到我登机前一小时，还收到他的最新修订。作为虔诚而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们是这个感官致死时代少有的醒者，我们这个千年吃货民族因而还有希望。

2012年圣诞节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食以民为天

——以“食”为鉴

（原版序）

1

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曾断言：“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著名美籍历史学家孙隆基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将以“吃”“口腔化”为突出特征的“身体化生存”视为中国文化最重要、最坚固的深层结构之一。

读著名美国人类学家西尼·W. 敏兹（SineyWMintz）的作品《吃——饮食、文化与历史漫谈》，发现西方饮食观尽管也很丰富，但大多拘泥于营养、制作等层面，远不如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那么复杂，隐秘，嚣张，厚重，沉重，致命，波谲云诡以至于惊心动魄。

迄今为止，我以为“吃”是汉语里最复杂的一个字之一，“吃”远远超过了食文化的范畴，它涵盖了中国文化中所有的秘密。在中国，“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如雷贯耳，堪称天条，它把“吃”从食文化的核心提升到了“国教”的高度；它像一只看不见的铁手，操控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运行轨迹，捏造出中国人特有的个体人格和怪诞的国民性。

中国食文化，或者说口腔文化是中国历史和母文化的独特视角和另一种认识论，如果将食物、食欲、饥饿、味觉、肠胃、器官、咀嚼、消化、烹饪、礼仪、酒、美食家等食文化元素都化为“坐标系”“显微镜”和“解剖刀”，来窥视和解

构中国迷宫一样的历史文化、特有的个体人格、怪诞而积重难返的国民性以及一切发生在中国人身上不可理喻的现象……所有的历史氤氲都烟消云散，所有的波谲云诡、秘而不宣都无处遁身，现了原形；同时，所有的不可理喻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我以为，吃是中国的国教。

我越来越对“民以食为天”这个天条产生了怀疑。我以为这句话颠倒了主语和宾语的位置，这一居心叵测、不易察觉的错位，导致了中国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阴差阳错、南辕北辙，中国所有不可理喻的事情也都因此而名正言顺。我以为，中国博大精深、夜郎自大的食文化只是又一件迷人的“皇帝的新衣”！在它炫目而迷人的外衣之下，在它狂欢、麻痹而不能自拔的感官刺激之下，蛰伏着的却是一张血盆大口——吃人！

中国口腔文化强调“料、色、香、味、形、器、礼仪”等一应俱全，可谓登峰造极，但它的发达是畸形的，只局限在技术层面。器物上的巧夺天工、烹饪上的眼花缭乱、味觉上的惊心动魄、礼仪上的繁文缛节，无一不是畸形的发达，终究只是一种奇技淫巧。中国口腔文化建立在一种消极甚至腐蚀性的力量上，彻底颠倒了人和食物的关系，让人成为吃的奴隶，口腔化生存。它缺乏宗教精神，缺乏人文关怀，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它以生活质量的低层次、人际关系的伪善化、社会风气的庸俗化、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饥民人格和国民性的形成和顽固、自我认知障碍、自我疆域的萎缩、超验和抽象思维的退化、人口的爆炸、民主的缺失、人权的庸俗化理解，等等为代价，这些恶果没有一样不是“吃”出来的，总的根子就在中国口腔文化那里。

我以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吃”脱不了干系，吃祸猛于虎！

而中国口腔化生存对味觉的片面强调，最终导致了中国人的饥民心理和饥民人格，这个最隐蔽，也是最致命的，因为人的疯狂行为后面总是藏着疯狂的动机。

2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美食家，但他们大量关于“吃”的文字，无一不是用象形文字的游戏及其特有的象形、会意功能及文字张力来缅怀和延续味觉的快感，这种层次的审美，充其量类似于优雅的“反刍”，始终没有跳出舌尖阶段，始终无



法导入超验轨道，始终找不到理智地看待中国食文化的片言残语。所以在我看来，所谓美食家，不过是一帮才华横溢的超级吃货——饕餮之徒，一群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瘾君子，他们华美文章的背后，是心理学和医学标准上的病人，堪称精致的行尸走肉！

犹太哲学家阿多诺说：“美学必须以真理性为目标，否则就会被贬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或者更糟，即被贬为一种烹饪观。”对中国美食家而言，真是一针见血。

环保主义者对于美食家的声讨，强调的也几乎停留在环保层面，谴责他们“吃”“滥吃”对于生态的危害，而没有刨根问底——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舍死忘生地迷恋口腹之欲？这样的变态口腔行为对灵魂有什么戕害？

而那些拿了执照的国粹家们大量的文字，又几乎全军覆没地陷入了他们习惯性的考据狂热和炫耀谰妄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们要么竭尽所能，将大量的食文化元素做详尽、简单、枯燥的考证、罗列和铺陈（充其量加入点名人典故），拘泥于孤立的、技术层面的、形而下的编撰。要么，他们概念先行，先入为主，沉溺于程式化话语方式的窠臼和艰涩术语的舞蹈和卖弄之中，以迷惑和威慑读者为天职。令人沮丧的是，文字本身的霸权往往可以让任何一个迂腐透顶的老学究达到一言九鼎、普度众生的目的。

他们就将这样的考证作为论证中国口腔文化或中华文化光辉灿烂的论据，就像一个家产万贯、得意扬扬的老财主，喋喋不休地向旁人炫耀他的家产，终究是一种仪式化姿态。我觉得这样的研究有个问题，只有堆砌，没有深入，只有展览，没有提炼；始终没有超越口腔来看口腔文化，没有将口腔文化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内在的，却又是决定性的影响揭示出来。结果就像在泥潭里表演杂耍，折腾得越精彩，溅起的泥星子越多，拍马屁拍得不是地方。我以为，中国口腔文化的意义实在远比他们拼命自我标榜的要致命得多，尽管更多的意义是负面的。

3

按照人类学家列维·史陀的观点，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可以通过食物的“熟”与“生”作为区分。那么中国无疑是个熟透了的，因而也是最腐化的文明。今天，

是向这个文明注入新鲜血液的时候了。

本书的创作动机源于我十多年来对中国口腔文化的零星思考。三年前，我的中学历史教师、我的精神兄长和盟友杨通茂先生曾写过一篇《“吃”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随笔寄给我。文章有一个独特的视角，给了我一些启示，让我动了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而2003年“SARS”（非典）的爆发是一个契机，终于对中国口腔文化来了个总清算。“SARS”过去不到一年，果子狸正式由“疑凶”成为“元凶”，确凿证明这场灾难是一场“吃祸”。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被“SARS”囚禁在家的那一段难忘的日子，我查阅并整理了大量关于中国口腔文化的资料，越看越害怕，我发现中国口腔文化中的糟粕比我当初想象的严重得多。中国口腔文化的发达是畸形的，它的发达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总体而言，中国口腔文化并不是什么光辉灿烂的文化精华，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凡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我以为，归根结底，中国口腔文化就是这样一种“蛮人”的文化。

但我痛切地感受到，要窥视这个秘密，要探讨和论证这个命题，却绝非易事。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吴思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个话题太大了，大到不好驾驭。”中国口腔文化博大庞杂，它和地理、物产、科技、医学、营养学、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民俗、礼仪、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密不可分，从任何一个点切入进去都盘根错节，简直如入迷宫，如临深渊。仅仅看一遍中国十多大菜系和不计其数的地方小吃的菜谱，也要奋斗终生；如果要增加一些感性认识，每一道菜肴亲口品尝一次，没有万贯家产和毕生精力的投入，也是“吃”心妄想。

中国口腔文化的玄妙，就像中国菜肴一样，各种味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很难把它分离开，理出一个头绪来，所以我批判中国口腔文化，也就像一个蹩脚的厨子加工一道复杂的菜肴，原料、作料一大堆，什么味道都想要，什么原料、作料都往里面扔，最终不可救药地搞成了一锅“乱炖”（东北名菜，以制作随意，味道古怪闻名）。加上在反思过程中，一日三餐，餐餐都有嗅觉、味觉的刺激和快感轮番侵袭、贿赂和瓦解我原本就很脆弱的味觉和肠胃神经，感官冲击始终和理智胡搅蛮缠并常常占据了上风，以至于我像一个被击中了软肋、解除了武装的斗士，几欲崩溃而放弃；以至于我在批判口腔文化时，个别章节居然写得像表扬

稿——看来，还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吃了别人的嘴软。”

所以这本书对于目前的我而言，即使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充其量也只是一部半成品。要彻底搞清中国的口腔文化，也许需要100个形形色色的持证专家、学者持续不断地努力。

4

中国口腔文化的危害如此隐秘、严峻而又紧迫，以至于我这个学养欠缺，而又徒有一腔热血的无证作家都按捺不住，就像一个羸弱之人看见一堵倒向人群的墙就下意识地冲了上去，既是奋不顾身，又是不自量力——无知者无畏，皇上不急太监急，我是准备做烈士的。

我第一个“跳出来”讨伐中国口腔文化，绝对不是表明世人皆醉独我醒，而是因为味觉的超强逞能，在理智麻痹之前的本能反抗，是一次舌尖下的中国的突围。也是因为那些沉溺于口腹之欲不能自拔的美食家们无意的误导和那些以粉饰太平为己任的专家学者们的有意无意的不作为，引起了我的不快，激发了我的莽勇。大言不断地说，是为了引起对中国口腔文化反思、警醒、澄清、扬弃、通缉和取缔的注意。

我以为，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

一个健忘的、不善于总结和汲取教训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非典”灾难之后，中国人亟需一次关于中国口腔文化的反思，这就是我的尝试。尽管我知道，要改革中国人的食文化观念，犹如螳臂挡车、虎口夺食一样艰难而危险，也许注定还是一场徒劳。

正如中国饭局里最著名、最玄奥、最直白、最无耻、堪称石破天惊的那句酒谚：“一切都在这杯酒中了！”在我的坐标系里，中国人的灵与肉、恩与怨、是与非、曲与直、爱与恨、情与色……一切都在这本书里了。

这一锅凌乱的、不伦不类的“乱炖”，我姑且做之，大家姑且尝试。如果你能够品出一丝别样的味道，那将是我意外的惊喜。如果能够因此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肠胃，稍微关注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关爱自己，关爱他人，关爱一切生命及生命家园，在大快朵颐之际能够突然打一个激灵：“我这样下去会不会犯饕餮罪？下地

狱？”那将是我的莫大幸福。

我以为，什么时候中国口腔文化能够从“民以食为天”这个误会回归到“食以民为天”这个应有的位置，我们这个沉溺于口腹之欲几千年之久而不能自拔的吃货民族，将终于可以走出反复口腔化生存的悲哀宿命，则你我幸甚，民族幸甚，文化幸甚，时代幸甚，地球幸甚矣！

5

本书初版《吃垮中国》因急于反思“非典”仓促出版，不乏粗糙纰漏之处，诚惶诚恐。三个修订版内涵比起原版宽泛多了，更多以“食”为鉴，顾“口腔文化”而言“他”。现在奉献上最新修订版，基本观点、论证方式和框架没有改变，思路更加清晰，视野有所拓展——如中西方饮食观对比，材料增、删了不少，数据升级换代。

额外感谢我尊敬的、杰出的历史学家孙隆基教授，他的作品在我读中学时就像一颗流弹深刻地击中了我。本书修订版完成后，远在美国的他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给我一些指导和启示，并欣然撰写了一万多字、如此严肃而美妙的序。

2003年春初稿

2004年秋、2006年秋

修订于北京东大桥

代序

魔鬼的礼物

孙隆基（美）

孙隆基简介：著名历史学家，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上大学，获台大历史学硕士。后赴美深造，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俄国史硕士学位、斯坦福大学东亚史博士学位。任教美、加多所大学，2005年起为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作品：《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未断奶的民族》《中国国民性：从国家到个体》《美国——弑母的文化》等。作品影响巨大，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出版前曾在80年代以复印件的方式在国内流行。

1

伊朗史诗《群王书》中有一则故事：魔鬼阿里曼化身成少年伊别利斯，自称名厨，向国王扎哈克毛遂自荐，愿为国王烹调。“当时的菜色不多，人们并不为了吃而去杀生，而是靠大地所产的蔬果为生；因此邪恶的阿里曼设计宰杀动物，提供鸟兽作为食物。他让国王尝血，使他如狮子般凶猛，但却像一个奴隶般服从他。”伊别利斯烹调了各种山珍海味，让国王大宴四天，酬劳是只需让他在国王的两肩上各吻一下。不久，扎哈克两肩上各自长出一条蛇。群医束手无策，把它们切割掉又长回来。后来，伊别利斯又出现了，对国王说：“这是你的命运，不能把蛇切掉，只能让它们活，且必须用人脑喂食它们，令其饱食而熟睡。”于是扎哈克每天宰杀两名少年，取脑喂蛇，从此成为暴君。

这是否只是素食者杜撰的神话？还是上古宗教智能的结晶？《群王书》写作于

伊斯兰教得势的时代（十世纪至十一世纪之交），但诗人斐尔道西收集的资料却是前伊斯兰的，有的可能上溯至波斯人和雅利安人尚未分化之共同始祖时代。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创立的宗教，不论是佛教、耆那教、印度教都有“戒杀生”的教条。扎哈克与伊别利斯的故事，是否具有共同文化根源？

在伊斯兰诸民族里，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并不注重吃，而伊朗人则好美食。在西方诸民族里，法意等国的烹调术特别发达，而条顿民族则不好此道。伊朗人是古波斯帝国的遗裔，拉丁民族则是罗马帝国的遗裔，相形之下，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条顿民族都是入侵文明的“蛮人”，他们颠覆文明，也使文明再生。野蛮如果是活力的同义词，“文明”往往与“颓废”等同。伊朗的《群王书》透露出一种爱憎双重性情感，视人为智巧的“文明”为魔鬼的礼物。

人类学家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即用“熟”与“生”作为区分“文”与“野”之符号。由此角度看，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而潜台词是“恐怕也是最腐化的民族”。李麦逊说中国从三代开始，就是以炊具作为权威象征，“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而贵族的品级则以饮具“爵”定位。如果烹调象征“文明”，中国人进入文明境界之早之彻底，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吧。

《周礼》是中国古代理想化的官制，它把政府分成天、地、春、夏、秋、冬六个部门。天官是六部之首，其首长“冢宰”是名符其实的宰相，其属下的官吏竟然像一个筹办国宴的班子，它与庖厨有关的名目包括：大宰、小宰、宰夫、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甸师、兽人、渔人、鳖人、腊人、酒正、酒人、浆人、凌人、笱人、醢人、醯人、盐人等等。国务总理的前身原来是皇家大厨子！“宰”是屠夫和在宴席上割切肉食的师傅。《史记·陈平列传》说：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陈平，少年时曾在乡里庆典上主持分配切肉，因为分得很均匀，乡亲父老们称赞说：“善哉陈孺子之为宰也！”认为他将来会成为一位好宰相。

这种官制是否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古代小亚细亚的希太帝国也有类似体制，因此，并不排除中国古代政府在“正规化”之前，其前身是“官内省”一类的机构。但《周礼》不是在谈历史，而是理想政府的蓝图，曾有人将它比作柏拉图的《共和国》。在《周礼》的理想国里，政府的第一部门“天官”关注的就是民“以

为天”的“食”。显然，这类本土化的思考比马克思主张取消异化状态的“劳动者的自由结合”“个人之全面发展”更能道出中国乌托邦的实质。

2

前面写的是一个楔子，却提醒我有二十年没谈中国人的“口腔化”了，这次看了李麦逊《舌尖下的中国——一个民族的灵魂囚笼》，有感而发，下笔不能自休，洋洋洒洒地写成一大篇，那是由于他这本书给予我的震荡，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平息。不只是他笔下的中国人“吃相”令人瞠目结舌，而且也使我看到当年只是开了一个头，要对“口腔文化”深入研究，前面还有一大片待耕耘之地。因此，这与其说是互相激荡，还不如说是让我重拾未竟之业。

李麦逊挑起到底是“民以食为天，还是食以民为天”这个争议。他找到了研究中国人的新方法：把“吃”提升到认识论高度，作为透视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在他笔下，食物、食欲、饥饿、味觉、器官、咀嚼、烹饪、礼仪、酒、美食家等“口腔文化元素”都化为“坐标系”、“显微镜”和“解剖刀”，以窥视和解构中国的母文化和国民性。李麦逊以“没执照的作家”自况，他自以为不入流的方法却取得了学院派不能及的效果；而他介于小说家和学者之间的语言，则将冷冰冰灰蒙蒙的历史变得栩栩如生，尽管更多的时候，他呈现给我们的，像杯盘狼藉的残宴，面目狰狞。

李麦逊还对我们这些“拿了执照的”却不作为的学者颇有微词，自称“皇上不急太监急”“无知者无畏”“准备做烈士”，等等。我由于“流放”国外已逾半个世纪，对国内情况已有疏离感，但仍然在《舌尖下的中国——一个民族的灵魂囚笼》中看到“中国文化深层结构”这个千年魔怪而今又舞翩跹。随着经济的发展，群魔乱舞换了新的“场景”，但后果则更堪虞了。

我的书成于二十多年前，根据的印象是海外华人，尤其是在北美的港台留学生。留学生的生计还是比较拮据的，没有条件过李麦逊笔下的当代中国人那种靡费的饮食生活，虽不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但他们“人格成长的危机”是泛中国化的。

首先，这些人对外界毫无好奇心。本来，任何国家有机会出国者就不多，很庆

幸能处身新环境，人格内容应该翻新才对。在美国那样的国度，同年龄的人也会争取私生活，到了周末会从事约会异性一类活动，来自其他国家（拉美、非洲或中东）的留学生亦会入乡随俗，唯独老中们却是伙了一大群同胞，轮流到对方的家里包饺子，围炉共嚼。他们的生活和社交圈子似乎早被饮食习惯所决定。其他人士无法融入这个“以吃为纲”的群，遂沦入“视之不见名曰夷”的范畴。

这种“为腹不为目”的人格无魅力可言。这些留学生不同于李麦逊笔下吃得天昏地暗、萎靡度日的国内人士，多半很能干，办事也颇有效率，有的人甚至拿到两个学位，但人格组织以“吃”为中心则如出一辙。有的人担忧将来在美国小城镇找到教职，连购买一瓶中国酱油都必须开车一个小时，到时麻烦就大了！有的人移民加拿大，挑选移居地的准则是该地中国餐馆是否够水平。也有人凡旅游至一地，一下飞机就先找上佳的中餐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至于该地的名胜古迹，不论来过多少次，一概不知、不闻、不问。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我造了一连串名词来形容这种人格：口腔化、身体化、母胎化、儿童化、人情化、老年化、非性化、太监化，等等。当时用结构主义把这些特色整理出一个条理：中国人的个体是“身”，它缺乏内在动态开展过程、成长阶段不明朗、特多人生早期的遗留，呈现严重的“口腔化”和“母胎化”倾向，在比较落后的国内，这样的个体连身体动作和排泄物都无法自控，而必待外力他制他律，这个必须由“二人”母体镇止的儿童化个体，亦得由这个外力推动，因此，这个不成熟的“一人之身”也会透过“二人”之人情化媒介提前老年化，未让青春期呈现高峰而及早步上“安身”之途，此倾向之心理基础或许仍不脱母胎化本色，但其外铄的渠道则是高度成熟的人伦关系。总的来说，中国人个体的存在是形而下的“身”，而超越此“身”的精神活动则是“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心其实也是肉做的，但既然超越了个体，就达到集体和大体的境界了。中国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平天下”，是国家这个“心”对社会这个非组织化的“身”之照顾、镇止与推动。中国人这种“超越”迥异于犹太基督教与印度宗教里精神对物质的超越。

这是二十年前得出的结论，至今日认识已深化，概念也更精微，亦即是不把事情作简单化处理。其实，今日中国某种程度的“人欲横流”该是和李麦逊笔下放纵

滥吃平行的现象——食与色、饮食与男女同具“身体化”特色。反而，克服身体化的人格——是瑞士学者冯客（Richard Dikotter）所谓的西方人那种“超脱形体和自主的自我”——对性必有隔阂。这一点，我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深有感触。澄清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李麦逊笔下中国人对“吃”毫无焦虑感的现象。

3

李麦逊提到现在中国人已普遍出现肥胖症。这是趋向“发达社会”的征候，在今日的美国人身上更加严重。这个问题也是“吃”出来的。但美国人不好美食，问题都出在高热量、高糖分、高脂肪、高胆固醇的成品化的“垃圾食品”上。不用说，美国社会上下弥漫着焦虑感，而其所用之语言是怕身体被“异体”侵占，个人失去主宰。这种形容他们曾用于共产主义的渗透，更常见对他人侵入自我疆域的恐惧上头。和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纠缠不清习以为常一样，讲到吃食，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对“异体入侵”之焦虑，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以装到自己肚里去。世上没有什么都吃的民族，中国人是唯一例外。

重美食的伊朗人也信奉伊斯兰教，忌口的项目基本上和犹太人相同。犹太教教规指定：某些动物不准食用，可以食用者如已死亡或为其他动物所杀，也不能吃；屠宰可食用的动物必须采人道方式，食用肉类时不能带血，身上某些部位必须摒弃；肉类不可和乳制品共食，因为它有母子一起被吃的嫌疑，这是罪孽；盛载不按教规清洁的食物之容器不得接触清洁的食品，等等。此外，还有发自动物立场的限制：人类不得在一头饥饿的动物眼前进食，必须先喂它；带动物外出散步到可以觅食的地方，不能给它戴上口罩，等等。忌口的概念全世界都有，犹太教最有系统也最全面，和它两极化的该是中国人。去年东亚地区流行的“非典”之起因正是吃野生动物，中国人也因此一度在国际间被当做是载体隔离。

中国人的滥吃滥杀，已与生物的生存本能脱离关系，而纯粹是文明的腐化。20世纪80年代，国内将改革开放以来推陈出新的烹调术拍成纪录片在海外放映，我在美国看到一部，其中厨子用毛巾护两手捏住一条鱼的头和尾巴，只把鱼身在沸油里炸熟，上到菜桌上，大家已经动筷，那个鱼头的嘴巴还在翳动，作无声的呻吟。这幅图像在国外绝对不会制造好印象。果然，外国报章上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出中国

人一次洋相。90年代初，美国东岸报章上有广东猫餐馆的报导，还登载彩色图片，只见厨子一脸凶馋相，把一头猫活活地投入沸腾的开水中，让它皮开肉绽，以便剥食。一位美国老头看了说：“它让我心碎！”《舌尖下的中国——一个民族的灵魂囚笼》中有一章叫“动物在中国的血泪史”，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让人“心碎”的描述。

我在二十年前曾说过：“传统中国的酷刑，其残忍的程度，以及种类之繁多，不愧为世界之最，例如，‘劓’即是切成肉丝、‘醢’即是剁为肉泥、‘刵’则是拦腰斩成两段、‘烹’即是下油镬、‘炮烙’即是烧烤，此外，还有剥皮等等。其手法之精致，似乎都与中国式烹调术有关联。”这只是一个灵感，并没有进一步研究。李麦逊则把中国古代的“十大名菜”和古代“十大酷刑”作了详尽的对比，令人唏嘘动容。

李麦逊进而提出：“对动物的残忍就是对人类自己的残忍。”口腹之欲不仅涉及到生态问题，而且直指普世价值观，或者说“世间法”的层面，这归根到底涉及善恶问题。李麦逊对此谈得较少，我不妨在此展开一下。

4

世界各大宗教对“邪恶”问题都在寻找答案。印度宗教都有“戒杀生”戒律，最彻底者莫如耆那教，认为唯有透过“戒杀生”灵魂方能卸掉业报，跳出轮回。这种看法视人间“邪恶”本源是生物界的弱肉强食。动物处身“必然王国”，是受本能的驱使，人类的残杀行为则远远超出充饥的需要，透过文明的中介，把生物本能的杀机变成一种政策、制度、工业，甚至艺术。

印度人的答案是绝对超越自然世界。据说耆那教的大雄（摩诃毗罗）就是绝食而死，因为他把“戒杀生”推衍至极端。严格地执行耆那教教义，人根本不该坐椅子，因为这样会压死亿万微生物；人也不该穿衣，它会造成更多微生物伤亡。但这种教还想传下去的话，教徒顶多做到吃素。在素食里则不吃某些带根的植物，也避免天黑以后进食，以免不谨慎把虫子吃进口里。

如果自然界就是互相残食——我们的身体其实每一刻都被病菌侵蚀，死后则变成尸虫的大餐——人类从事“戒杀生”就是一厢情愿，并没有阻止自然界的操作。